

《高教论坛丛书》之一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论中国高等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教论坛丛书》之一

论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教论坛丛书》之一
论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千

1987年8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 001—8 500

ISBN7-303-00063-1/G·53

定价：1.60元

目 录

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 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的贺信	李 鹏 (1)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总结高等 教育的经验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蒋南翔 (2)
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	蒋南翔 (8)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体理事会上的讲话	
.....	何东昌 (13)
论在我国大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体理事会和学术讨 论会上的发言	蒋南翔 (25)
关于高教工作的若干问题	朱开轩 (42)
从哈工大五十年代办学经验谈当前的教育改革	
.....	李家宝等 (55)
高等学校应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	丁石孙 (66)
努力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高景德 (72)
关于研究生教育发展和改革几个问题的探讨	
.....	吴本厦 (78)
关于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的研究报告	
.....	高 岩 (84)
师资培养工作是高校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谢希德 (94)
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与研究生制度的改革	潘懋元 (100)
教学质量是衡量高等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	母国光 (107)

发展校际合作 建设开放式的教育与科研中心

.....	吴咏诗 (113)
高等学校如何继承与发展“一二·九”运动 的革命传统	
——在中顾委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五 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蒋南翔 (118)
谈谈高等学校的学风问题	顾明远 (126)
进一步端正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	陆铁仪 (131)
做好教育学科人才的培养工作	袁运开 (139)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要面向实际	何东昌 (143)
谈高等工业学校老系、老学科、老专业的 改造与发展	
谈谈培养大学生的能力问题	樊恭烋 (161)
对教学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王义道 苏志中 (172)
必须大力加强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	李卓宝 (178)
苏联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动向	黄仕琦 (182)
编后话	(187)

李鹏同志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 届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的贺信

南翔同志请转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会全体同志：

欣闻第一次理事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谨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慰问，理事会的许多同志都是中国教育战线上的老前辈，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理事会的召开，必能对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挥重大作用！

听说理事会要讨论怎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四化人才。我认为这个题目是十分恰当的，是很重要的。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要走出一条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路子，关键在于人才，而我们所需要的人才，不是别的人才，而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献身于经济改革、科技改革和教育改革事业的人才。

我是教育战线上一名新兵，对搞教育完全是外行，只能为教育和经济建设的结合做一些协调的工作。教委会的主要工作，要依靠以何东昌同志为首的党组来做。在此，我诚恳地希望教育战线的老前辈们能为新成立的教委会不吝赐教，给予指导和帮助。

此致

敬礼

李鹏

1985年8月3日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 总结高等教育的经验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薄南翔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筹备，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建国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有许多缺点、错误。在这个重要领域，集中全国有实际教育工作经验的同志对我们走过的道路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宗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总结我们自己在高等教育领域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利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错误，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日益巩固和完善，从而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的一句话：“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这句名言所体现的关于新型的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论点，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要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我们的旗帜和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要在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两个“彻底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对共产党的纲领的最基本的概括。很明显，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直到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也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重大改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顺利也会有曲折，甚至难免有局部的暂时的后退。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的教育，从根本上说，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它所培养的一代又一代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服务。只有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使命，也才能明确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这个总的要求和方向相适应。

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在当前，就要能够适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说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外国的模式，经济建设如此，办文化教育也如此，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特点；二是说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同时，坚持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和其他一切反社会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这样，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既要有现代的科学文化专业知识，并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来

运用这些知识；又要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和觉悟，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人生观，敢于同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他们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先锋，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当然，这样的要求是很高的。现在，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总结自己的经验，就是为了脚踏实地地、坚定地朝着这个要求前进。

回顾我们30多年经历，尽管有很大的曲折，但毕竟我们的教育已经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取得力量和信心。首先，经过建国以后的改革，我们打破了旧中国封建买办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传统，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教育的指导地位，这是关键的一点。第二，与此相适应，我们在改革中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培育学生的要求和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第三，我们在教学中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恶习，并逐步把教育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联系了起来。第四，特别在这几年来，发展教育的视野和途径也大大扩展开来。刘少奇同志在60年代初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如何使我国教育制度与社会需要更好结合的具体创议，并在当时的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是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惜，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少奇同志所说的“两种教育制度”，一类是指正规化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一类是指其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多方面需要的各种学制和办学形式。现在多种形式的办学，包括自学，已经有很大发展，追根溯源，不可忘记少奇同志所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在我国教育史上所起的先驱作用。应该明白：过去的工作成就和成功经验，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过去的工作错误和失败经验，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不可忘记历史。如果对过去的有益经验或惨痛教训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无

动于衷，置若罔闻，就将不免走弯路，要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高昂代价。离开深入地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就不可能承先启后，科学地制定今后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

有人曾经说，建国以来大学没有培养出人才，特别是没有出优秀人才，造成了所谓“人才危机”。在某些人看来，新中国教育一无是处，只落得“令人叹息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陈云同志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必须肯定，70年代、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当来之于这些50年代、60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这是对我国广大中年知识分子的高度信任，也是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的正确估计。事实说明，建国以后培养的几百万大学生中，许多人只要有一试身手的机会，就脱颖而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包括一些做出了突出成绩的人，例如突破多年来轧机斜轨辊的模式、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和二等奖的陈惠波，创造杂交水稻技术、带来大幅度增产、荣获国家发明特等奖的袁隆平，在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中做出了创造性成绩的周光召、唐孝威，在数学领域显示了杰出才能的杨乐、张广厚，在核苷酸顺序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洪国藩等等，就都是我国50年代和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

值得提出的是，在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中年以至青年知识分子中，已经成长起来一批新的共产主义者。众所周知的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同志，就是中年知识分子中共产主义新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我国急需的科学技术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成绩，而且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把自己的这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80年代的新雷锋——张华和张海迪。他们那种革命的忘我奋斗精神，显示了新中国青年高尚的道德风貌。

以上简单的回顾说明，3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我们已经开始培育出一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可以说，尽管我国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水平还不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国教育的指导思想远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我们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远远胜过了它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我们新中国的大学生，又红又专，绝大多数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自觉地服从国家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应该说，这是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也是新中国教育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成就，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不可能大量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先进人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在高等教育这个重要领域，我们应当振奋精神，增强信心，而绝不应当自暴自弃，丧失民族自信心。

当然，我们必须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切有益的经验，但不可“邯郸学步”，不加分析地把西方世界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国情和需要的东西，一概当作新思想、新经验来宣扬和模仿，轻率地抛弃我们自己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可贵经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以后，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推动广大教育工作者满怀信心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我国未来希望所寄的青年学生中，代代相传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保证我国长治久安，取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注：此文刊登在《中国教育报》时，该报加了以下的按语：本文是作者1983年5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没有发表。时间过去了四年，这篇讲话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现征得作者同意，在本报正式发表，内容未加改动，供读者作研究高

等教育领域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参考。)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国高教学会会长)

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

蒋 南 翔

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评价教育的成败优劣，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两个根本问题解决得如何。

一、方向问题。这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是教育战线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建国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要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在根本原则上指明了新中国教育的方向。遵循这个方向，教育战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我国教育史上最伟大最根本的变革，不但把旧中国处于非法状态的马列主义光明正大地列为大学必修课程，并且把它确定为我国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我国高等学校在解放初期进行了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把旧中国庞杂、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高等教育改造成为统一、先进的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奠定了巩固基础。这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上正确解决了方向问题所取得的伟大战果。

我们要为祖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我们的办学方针，必须贯彻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四

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勇敢前进。如果教育出来的大学生不是真诚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缺乏理想，不守纪律，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羡慕西方生活，只知追逐私利，不惜败坏国格、人格，那么，忠诚的教育工作者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我们应当分清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大界限。资本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所谓自由竞争，把学生培养成为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所指望的那种“民主个人主义者”。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培养为人民造福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在这个问题上，两者的界限，泾渭分明。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意模糊人们的视线。他们鼓吹说：“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作为正统思想不能突破。这就是一个大学讲台所必须有的特征。”“大学就不应受某种思想的约束”，而应当成为“自由讲话”的地方。联系他们公开发表的大量言论，不难看出，他们所要“突破”的绝不是马列著作中个别过时的论断，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所要的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就是任凭违背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违背甚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我们的大学“讲台”上“自由”泛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一来，我们的大学将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高等教育同资本主义高等教育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这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决定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成败的最根本的关键。只有方向明确，才能统一思想，集中力量，

使高等教育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手段，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假使方向不明，目的不清，思想就难以统一，力量就难以集中，就会彷徨无主，趑趄不前，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方向问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现在我国教育工作中出现一些追求形式、弄虚作假的现象，甚至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出卖文凭的腐败现象，也传染到教育界来了。这种情况，将有害于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新一代。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来说，恐怕没有比坚持正确方向更为重要的了。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和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思想，克服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观点，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

二、质量问题。这是解决怎样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

提高教育质量有如登山，每前进一步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建国以后，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大体上是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的。我国若干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到国外许多著名大学作研究生，大多数人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说明中国学生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其实，中国学生的优势，不仅仅是学业成绩优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质，有为社会主义祖国而学习的先进思想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正是推动中国学生不断奋进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质量，比之资本主义的大学，实际上要求更高，更全面，更科学。

过去有人指责我国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不出人才，尤其不出拔尖人才，这不合乎事实。我国教育事业在前进过程中不免会有

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决不能因此一笔抹煞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成就。只要考察一下现在我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挑大梁起骨干作用的优秀人物，绝大多数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仅仅指出这一点，就可对新中国能否自己培养人才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答案。我国有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蒋筑英、罗健夫式的先进人物，他们不但是新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英雄。象他们这样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大批英雄人物，难道资产阶级的学校能够培养得出来吗？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在经济上要求创造出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教育上要求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培养出大量又红又专的具有世界一流科学水平的各方面人才。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对此应该有信心。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我国青年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精神，脚踏实地，循序前进，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过去我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和回收问题，这些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女排在体育上能够做到的，在培养高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上，中国的教育也将能够做得到。我们不可无视旧中国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和资产阶级买办教育的遗毒，应在青年的思想教育中注意培养正当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去掉各式各样明显的或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民族自卑心理。这样才能帮助我国有志青年冲破无形的精神枷锁，真正解放思想，敢于实事求是，从而获得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上的强大无比的内在动力，更有可能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捷足先登，较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创造出名副其实的高质量。

当然，我们要求质量，也要求必要的数量。我们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数量。经验反复证明，没有质量的数量是

空的。盲目地追求数量，将造成巨大浪费，留下后遗症。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对红与专的问题作过深刻的阐述：“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这在实质上解决了方向问题和质量问题的全面要求。要求红，这是方向问题。“红一定要专”，这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不能满足于做空头政治家，要努力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精通业务，精益求精；“专不等于红”，这是帮助精通业务的专家提高认识，扩大视野，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不要自我满足，妨碍自己的不断进步。我们教育战线的同志和所有真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好好领会和实践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有关又红又专的深刻思想，现在仍有重要意义。

（注：本文原载1985年7月30日《中国教育报》的《高教园地》专刊，《红旗》杂志发表时经作者作了一些增补。）